

金冲及
文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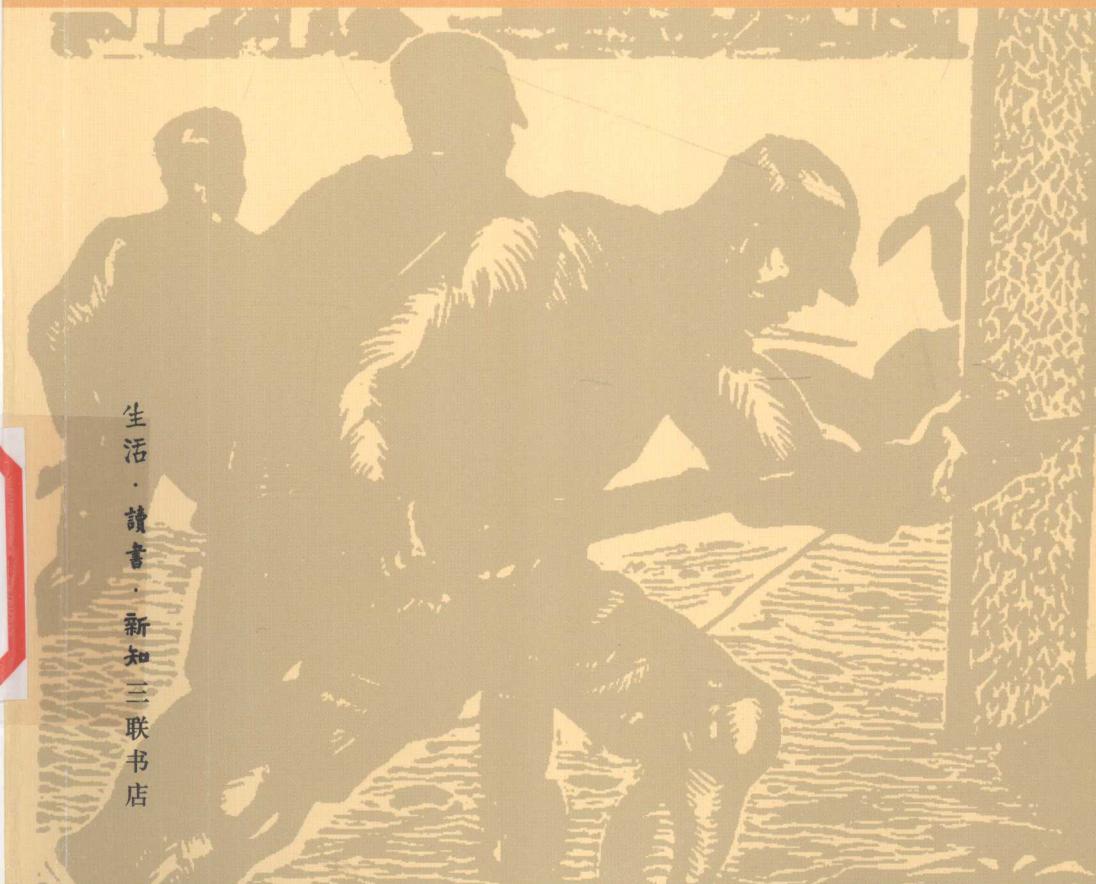
金冲及

著

生死关头

——中国共产党的
道路抉择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生死关头

——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金冲及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 / 金冲及著. —北京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8
(金冲及文丛)
ISBN 978 - 7 - 108 - 05596 - 5

I . ①生… II . ①金… III .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 ①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4881 号

责任编辑 马翀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6.25

字 数 294 千字

印 数 00,001—15,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前　言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大后不久说过：“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曾多次地面对道路选择的问题。为什么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不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同各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是一个和任何西方国家不同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经济文化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各地发展更是极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无论革命、建设和改革，遇到的都是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这些新问题，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在书本和别国经验中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办法，只能靠中国人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迈开步子，大胆探索，从成功和失败的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自己的正确路子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轻便的路可走。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有百分百的把握才起步。中国的情况又那么复杂，面对的事情有许多未知数或变数，对路该怎么走，自然会有不同的主张，甚至会发生激烈的争论，需要进行抉择。而周围的客观局势又总是那么紧迫，曾经多少次处在生死关头，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再行动。许多事情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下决心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做种种尝试，由实践来检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当

年作出选择和决断的艰难，也许是生活在和平日子里的后人很难完全体会得到的。检验的结果，有时证明做出的选择是符合实际的，便取得巨大的成功；有时做出的选择并不符合实际，便会遭受挫折，甚至有时会濒临失败的边缘。这种在探索和学习中前进的历程，无论成功也好，一时的失败也好，都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上空前的剧烈迅猛的变动中，一个问题解决了，立刻又有新的异常复杂的问题被摆到人们面前，需要做出新的选择和探索，前后相续，从不间断。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在实践中不断把成功的选择和失败的选择做比较，有时呈痛苦的反省，终于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包括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正确道路，百年巨变，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它得来是多么不易，是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我们所以能充满道路自信的根据和由来。

历史是人们实践的记录。这本小书中的一些内容，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些重要历史关头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如何加以丰富、发展或调整的过程。希望书中叙述的历史事实，多少能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文章是多年中陆续写成的，结集时除极少文字校正外一仍其旧，论述中如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金冲及

2015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 1

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 2

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6

三、对种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的比较推求 11

四、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开端 18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22

一、关于辛亥革命 22

二、关于五四运动 30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5

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 42

一、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会出现这样一场大革命? 42

二、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能够形成? 44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了什么? 45

四、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和蒋介石反共活动的抬头 47

五、北伐的胜利进展和蒋介石的反共政变 49

六、党的继续妥协退让和大革命的失败 51

七、结语 52

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 55

一、“左倾”盲动主义的狂热 55

二、探索前进中的徘徊 58

三、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它的影响 65

四、六大的前进与局限	69
五、简单的结语	74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	76
一、大革命失败和第一次“左倾”错误	76
二、革命走向复兴和第二次“左倾”错误	90
三、“国际路线”和第三次“左倾”错误	109
四、产生错误的根本原因	129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	137
一、分歧的实质	137
二、矛盾的激化	140
三、历史的转折	142
四、新传统的形成	143
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	146
一、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进入贵州	146
二、几种政治力量的剖析	152
三、从黎平到遵义	164
四、四渡赤水，西进云南	176
五、结语	191
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194
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194
二、瓦窑堡会议	198
三、东征和晋西会议	205
四、对两广事变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反应	213
五、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219
六、西安事变前后	228
从十二月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	241
一、中共中央在抗战爆发初期的决策	242

二、王明归国和十二月会议	245
三、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253
四、在共产国际的讨论	261
五、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265
六、结语	271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274
一、民族自觉的新高度	275
二、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	279
三、中国共产党被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282
四、结语	285
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毛泽东和蒋介石	287
一、关于毛泽东	290
二、关于蒋介石	302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308
一、为了共和国的诞生	308
二、绘制建设新中国的蓝图	311
三、人民共和国开始起步	315
新中国的第一年	321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334
一、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337
二、关于“大跃进”	345
三、关于“文化大革命”	353
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362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370
一、三中全会的前夜	371
二、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372
三、新时期基本格局的形成	373

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开始	375
五、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378
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	380
一、20世纪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	380
二、牢牢抓住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385
三、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387
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之初的行动纲领	389
一、新世纪面对的新形势	390
二、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392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396
四、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399
征引文献	402
一、报刊征引文献	402
二、图书等征引文献	404
三、海外征引文献	413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1]

——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所占的突出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那是个充满着疾风暴雨的日子。先进的人们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发动猛烈的进攻，形成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许多在黑暗环境中极度苦闷的青年人，在思想界卷起的这场巨大波澜中，猛然望见了新的曙光。他们反复比较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潮，思考中国的现实出路在哪里，并以大无畏的气概向未来探索。

从比较和思考中，人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批判目标的一致远不意味着选择目标的一致。反对旧思想、旧观念时曾经并肩站立在一起的亲密伙伴，逐渐发生了分化。多数的先进分子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奔集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年轻的瞿秋白，在五四的第2年写道：“中国社会思想到如今，已是一个大变动的时候。一般青年都是栖栖皇皇、寝食不安的样子。究竟为什么？无非是社会生活不安的反动。反动初起的时候，群

[1] 本文是作者在1989年5月5日至7日召开的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上提交的论文。

流并进，集中于‘旧’思想学术制度，作勇敢的攻击。等到代表‘旧’的势力宣告无战争力的时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潜伏的矛盾点——历史上学术思想的渊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则——渐渐发现出来，于是思想的趋向就不像当初那样简单了。”“我和诸同志当时也是飘流震荡于这种狂涛骇浪之中。”^[1]张闻天生动地描述过自己当时的思想旅程：“我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情意上早感到不安，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改造呢？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呢？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面一日不能去的。无抵抗主义呢？反抗主义呢？无政府主义呢？社会主义呢？如江河流水，不绝地引起我底烦闷。但永久不决定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长，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会主义一条路了。自今日起，我希望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做一个小卒。”^[2]为什么那么多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在当时最有觉悟又富有思考能力的青年，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思考后，做出同样的选择，把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现象有它的内在逻辑在支配吗？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

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凭空而来，总有它的来龙去脉可以找寻。为了探讨问题，我们不妨简略地回顾一下五四以前中国先进分子经历过的梦想和现实。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再也无

[1] 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0页。

[2] 张闻天：《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1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法照旧维持下去了。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既感到新鲜，又受到巨大的鼓舞。1903年日本留学生出版的《江苏》杂志上有一段话把他们这种心情写得淋漓尽致：“横瞰欧美之光明政局，旁探近代之革新历史，注目于其社会，关心于其国事，每有一种葱葱勃勃伟大昌隆之气象，目击焉而心花开，耳触焉而气概扬，不知不觉间激起吾欢欣歌舞羡慕恋爱之一片良感情，跳跃于心头而不能自镇。”^[1]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他们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这个斗争的高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投身这场革命的人长时间内充满自信，期待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2]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起过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

当时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活动程序方面。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

[1]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江苏》第5期，1903年8月出版。

[2]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式和活动程序也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了中国。很多人对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多月，还兴高采烈地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1]他所表达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听起来也颇为诱人。

奇怪的是，说起来那么动听的东西，甚至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一旦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准备好了，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掷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作 20 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迷惘、彷徨以至绝望。但是，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由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

[1] 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456 页。

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重新又开始新的探索。很早参加同盟会的林伯渠回顾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这是中国思想界大转变的重要契机。但新的道路并不是轻易就能踏上的。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最初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领域内。辛亥革命时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2]他认为，造成中国人民愚昧的根源是封建道德，而封建道德就是奴隶道德。他把伦理的觉悟看作“吾人最后之觉悟”，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3]他们这种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精神是十分可敬的，产生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从而为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但是，文化终究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腐败和黑暗，正如张闻天所说：“中国混乱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社会组织逐渐崩坏而一时不能产生新的社会组织出来。”^[4]如果不从根本上对这个社会进行改造，单从政治组织形式或文化思想下

[1] 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2]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

[4] 张闻天：《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1922年1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3期。

手，怎么能真正解决问题呢？北京大学学生何孟雄 1919 年 10 月在《时事新报》上谈到他们这种新的认识：“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希望咧！”^[1]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次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二、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现今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青年的注意：从 1914 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 4 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欧战结束后的下一个月，梁启超等动身去西欧游历了一年。他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普遍的沮丧、彷徨和“世纪末”的失魂落魄情绪。一个美国记者对他说：“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梁启

[1] 何孟雄：《过去的青年》，《何孟雄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 页。

超归国后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他在欧洲亲眼目睹的这幅凄惨景象：“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沈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他从中得到一个强烈的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1]梁启超素来以政治态度温和而又富于敏感著称。他的这些言论自然会在国内引起不小的反响。

鼎鼎大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时到中国来，到处演讲。他说：“诸君皆知道我相信社会主义的。我以为产业如何发达，若非社会主义行之，必定有不平之事发生，此阶级压制他阶级，苦者益苦，富者益富，弊害丛生。所以必须生产品、器具、土地、利益，皆归之公有，再分配于个人，不为私人所揽有，方为公道。西方社会主义是产业制度的结果，自然而然产生嬗化而来。”尽管罗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同时又鼓吹“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2]但连他都如此赞扬社会主义，终究也引起更多人对社会主义的注意，使人们感到社会主义比起资本主义来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制度。

至于有机会亲自到欧洲去看看的中国先进青年，受到的刺激自然更加强烈。周恩来在1920年底到达欧洲。不久他给天津《益世报》所写的第一篇通讯劈头就说：“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不安之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们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而复益之以战争中精神文明所得间接之损失，社会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9、723页。

[2] 罗素：《社会主义》，《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1年2月21日。

之现状遂乃因之以不安。”^[1]这就更坚定了他的这种信念：“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2]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察觉到它的阴暗面。孙中山 1905 年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3]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无非仍为少数人所支配。但这些问题那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何孟雄的一段话，反映了不少中国先进青年的这种认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

[1] 周恩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益世报》（天津），1921 年 3 月 22 日。

[2] 周恩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续篇），《益世报》（天津），1921 年 3 月 23 日。

[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288、289 页。